抗日战争史研究新趋向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抗日战争史研究新趋向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日战争史研究新趋向 /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编.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10

ISBN 978-7-5458-1904-5

Ⅰ. ①抗… Ⅱ. ①上… ②上… Ⅲ. ①抗日战争史—中国—文集 Ⅳ. ①K26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81104 号

责任编辑 邓小娇

封面设计 郦书径

抗日战争史研究新趋向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 编

出　　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0.75
版　　次 202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904-5/K・366
定　　价 128.00 元

编辑委员会委员

马　军*　　王美平　　甘慧杰

江　沛*　　江文君　　张　剑

张晓东　　陈　磊　　赵　婧

段　炼　　贺江枫*　　蒋宝麟*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为执行编委

序：同盟战争视野下的中国抗日战争

马　军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惨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历经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的召开，以及凡尔赛和约、四国公约、九国公约、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洛迦诺公约、非战公约等的签署，逐步构建起了国际性的新秩序和安全体系。但是，自进入30年代以后，德国、日本、意大利试图用侵略手段改变既有的世界格局，并借反共产国际协定(1936年)和三国军事同盟(1940年)、最终形成了法西斯轴心国同盟集团，其成员还有罗马尼亚、匈牙利、西班牙、保加利亚、芬兰、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维希法国、泰国、菲律宾第二共和国、自由印度，以及中国境内的伪满洲国和汪伪中华民国，等等。与之相应，1942年元旦，美国、苏联、中国、英国、自由法国、波兰、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希腊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该同盟后来扩大至50余国。

就基本样式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乃是上述两大同盟之间进行的同生死、共进退的同盟战争！

同盟战争，亦称联盟战争，指的是多国对一国，或多国对多国，为实现本国利益，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为实现共同利益而展开的军事行动。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战争样式，自古有之，中外亦有之。中国春秋时期，晋、楚两强逐鹿中原，长期争霸，常常各自纠集十几个国家进行会战；在欧洲，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1701—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乃至后来的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也都是同盟战争。在同盟战争的视野下考察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于准确理解和评估这场战争，具有特殊、多方面的意义。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全球范围内展开，除了中国武装力量为本国的独立和自由而战外，同盟双方搏杀的主要地域还有苏德战场、太平洋战场、北非战场、大西洋战场（后来的第二战场）、东南亚战场、中国东北战场等。显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是孤立的，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是局部和全部的关系。维护人类正义，彻底击败以德、意、日为核心的轴心国集团，并迫使其无条件投降，这既是中国，也是同一阵营内所有参战国最基本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具体来说，同盟国方面总战略的演变体现在相互关联的一系列国际会议和文件中，如《大西洋宪章》（1941 年 8 月）、《联合国家宣言》（1942 年 1 月）、卡萨布兰卡会晤（1943 年初）、开罗会议及宣言（1943 年 11 月）、德黑兰会议（1943 年 11 月）、雅尔塔会议及协定（1945 年 2 月）、波茨坦会议及公告（1945 年 7 月），等等。与之相应，在中国战场上，蒋介石的《庐山讲话》、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反映中国国共两党对日基本战略的一系列文件，亦是为了与上述总战略相协调，并促使其能够顺利实现。同样的，轴心国方面虽然被分割成东西两大块，但也是在侵略联盟总的政治军事战略下展开行动的。

同盟内的各国军队在各大战场上相互协同、彼此支援，是同盟战争的基本特征和最有效形式。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正面战场大小会战二十余次，敌后战场建立了 19 块根据地，牢牢地牵制了日本陆军的两大主力——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使其被迫放弃了北犯苏联远东地区的企图。苏军得以避免极其危险的两线作战，并最终将胜利的战旗插上了柏林德国国会大厦的上空。其间，包括毛岸英在内的许多中国籍战士还在苏军编成内参加了对德战争。

当然，这种支持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苏德战争爆发之前，中国曾 4 年单独抗战，其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包括飞机、火炮等，并向重庆派驻有军事代表团，甚至还有大批志愿人员参与了中日间的空战而英勇牺牲。在哈桑湖战役（1938 年 7、8 月）和哈拉欣河（1939 年 5 月）战役中，苏联远东军重创了日本关东军，使日本陆军蒙受了自明治建军以来从未有过的耻辱。正是慑于苏军的强大军力（即使在德军逼近莫斯科的最危急关头，苏联仍在远东保持着 40 个师的兵力），关东军主力一直无力入关增

援作战，中国军队的压力也因此大为减轻。更有甚者，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还直接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由此，苏联卫国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直接连为一体。三个方面军、170 多万人参与的苏联红军远东之战，直接解救了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呻吟多年的中国东北人民和朝鲜人民。70 多万关东军的全灭，使日本丧失了一个战略军团级的重兵集团，它和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的战略空袭以及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构成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三大原因。

中国战场和美、英盟国也存在着同样的互动关系。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了重庆后，曾引起了广泛的狂喜，苦撑待变 4 年之久的国民政府终于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正如预测的那样，中日间的战争最终与世界的战争同步起来了。此间舆论普遍认为，由于有了美国这个强大的盟友，战胜日本只是时间问题。国民政府遂抛开一切顾忌，于 12 月 9 日正式对德、意、日宣战。之后，美国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第 14 航空队甚至直接来华在中国战区编程内对日作战。中国参谋总部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则处理协调军事行动的具体问题，双方还互通情报和互派军事代表团。与此同时，为了支援英印、英缅方面，国民政府先后派出了数十万精锐部队南下出国与日本另一个战略军团——南方军展开搏杀。

二

结盟国家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参加战争，这是同盟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由于各参战国的政治目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战略地理位置等各有不同，因而对战争的实际贡献程度也有所不同。除了直接参与交战外，有的参战国仅限于同敌对阵营断绝外交关系，或是形式上宣战，或者对敌方实行经济封锁，或将本国领土、领空、领海、军事基地提供给盟国使用，或是向盟国提供财政、经济、军事等援助。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同盟国和协约国双方共有 30 个国家，但直接进行武装斗争的仅有 14 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同盟参加国的贡献亦远不相同，50 余国中实际上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并没有直接参加战事。

1840 年以来，中国常被描绘成一盘散沙，对外反侵略战争一个失败接一个

失败，几乎没有那一场能够捱过一年的。即使在“一战”中忝列战胜国，实际上也并未出兵。但是，20世纪30年代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却使中华民族空前觉醒并坚强起来，“二战”中的中国遂成了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参战国，中国军民英勇作战，中国战场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战场。其依据主要有四：其一，中国作战时间最长，从“七七事变”算起有8年之久，若从“九一八”算起，则长达14年。其二，中国军队牵制了日本陆军的主力军团（仅中国关内，日军不得不长年保持50至80万左右的兵力），既使其无法北侵苏联，又削弱了南进东南亚的军力。其三，中国军队在长期的交战中打死打伤数十万日军。其四，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人员牺牲和财产损失。很显然，中国对于取得此次同盟战争的胜利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由此，也成为当时世界的“五强”。

然而，作为一个落后农业国的中国并不是反法西斯同盟中的最强国家，虽然面对外敌侵略时不乏“拼全民族的生命”的勇气，但由于力量的悬殊，要单独战胜日本殊非易事。所以，苦撑待变，将中国问题的解决纳入世界问题的通盘解决，成了战时中国国家的最高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而这在很大程度必须依赖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工业国家苏联和美国的走向。在世界历史上，一个较弱的国家与比自己强大的国家结盟，以取得整个同盟战争的胜利，并不鲜见。

在经过了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之后，1937年苏联的工业产量已位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较之于西线、北非战场、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等，苏德战场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或者说是决定性战场，两大阵营的成败维系于此。这是因为轴心集团的主力是德国和日本，而核心是德国，不彻底战胜最具侵略心，作战能力和军工能力最强的希特勒德国，而想赢得整个同盟战争的胜利，那纯粹是一种奢望。大战期间，苏德战场在全民动员、战役规模、物资投入、伤亡程度、作战紧张度等方面，是其他战场无法比拟的。苏联武装力量在4年的激战中，击毙、击伤、俘虏德军达一千万人，占德国“二战”总损失的四分之三。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成了世界军事学术史上的典范。尤其是战争末期规模宏大的柏林战役，苏联军人在政治上、军事上、法律上彻底毁灭了希特勒德国，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最厚重的基石！苏联的胜利、德国的失败，即双方最强国家的较量结果，很自然地，会对包括中国在内

的各盟国的作战产生底定性的影响。

在远东，美国的参战根本改变了对日作战的力量对比，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营造的军事大国的地位由此受到了颠覆。1937 年 7 月日本发动了全面性的侵华战争，在此后的 4 年中，侵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如果说日本的军事进展归根结底源于其综合国力的绝对优势，那么在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则由盛到衰，变成了绝对劣势。仅以工业生产在全世界所占比重而言，1937 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分别是 38%、10%、11%、5%、4%，日本约及美国的十分之一。具体就战争进程而言，其一，美军消灭了日本武装力量的主力，特别是通过一系列大规模、高强度、现代化的海空作战，彻底毁灭了日本海军排水量近 200 万吨的联合舰队；其二，美军的海空攻击严重摧毁了日本国力，尤其是 1944 年 11 月末开始的战略轰炸，美国第 20 航空队对日本的 66 座城市进行了地毯式轰炸，其间共出动 B—29 重型轰炸机 17.5 万架次，投弹 16 万吨，造成了 50 万人死亡，日本 42%城市工业区被摧毁，军工生产因此濒临枯竭。其三，美国主导了战胜日本的法律和外交进程，参加了所有针对日本的重大国际会议，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45 年 8 月美军登陆日本本土在即，严重地威胁着日本国家的生存，正是慑于美国武装力量的强大威力，才直接地促成了日本天皇的投降决心。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弱国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在“二战”中成为战胜国，除了本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不懈意志并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外，还在于与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协力作战的结果，特别是自始至终坚定地与苏联和美国，即当时的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站在了同一阵营。这应该是考察中国抗日战争史的重要基点。

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2 周年暨全面抗战爆发 80 周年之际，并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拓宽研究视野与领域，2017 年 9 月 2 日至 3 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上海社科院“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承办的“抗日战争史研究新趋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与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与地区的 50 余位学者、研究生与会，提交论文 45 篇。

会议结束后，上海社科院“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与南开大学历史

系合组论文集编辑委员会，跟与会学者协商后，将其中29篇修改后的论文（另附会议综述一篇）结集出版。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其余与会论文未能收入此集，是为遗珠之憾。期待该论文集的出版，能将抗战史领域的最新成果呈现于学界与社会。

目　录

序：同盟战争视野下的中国抗日战争 …… 1

《抗日战史》的前世今生 …… 1
日本学界关于中日战争和亚洲太平洋战争称呼之讨论 …… 27
21 世纪以来俄罗斯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的新趋势 …… 40
2000 年以来法国的中国抗战史研究述略 …… 63
新世纪以来台湾地区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 …… 77
上海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 99
顾祝同与 1937 年淞沪抗战 …… 112
淞沪警备司令部与“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 …… 125
淞沪会战时期京沪、沪杭甬铁路的运输与财产损失 …… 138
近观战争
——蒋维乔日记中的抗日战争 …… 159
党内竞选与派系斗争：亲历者笔下的国民党“六全”大会选举 …… 172
抗战后期国统区的经济危机与道德人心
——基于国民党高层个人记述的观察 …… 197
中国科学社在大后方 …… 212
蒋介石、河北事件与“何梅协定” …… 229
拥立吴佩孚工作与日支民族会议 …… 253
浅议中共平型关战斗的决策、过程及反思 …… 270
抗战前国民革命军制式武器选定工作研究 …… 287

抗战中国战俘的数量问题及其研究展望 …… 309
旧解读与新诠释
——战时报刊中的日军细菌战(1937—1945) …… 321
“圣战”话语下的七七纪念：日本国民眼中的中日战争 …… 342
抗战结束前后美国制定扶蒋反共政策的国际背景 …… 360
《支那事变画报》研究 …… 376
从“中东路”到“九一八”：张学良处置政策的演变轨迹 …… 393
试析《中国公论》的奴化宣传 …… 407
“灰色地带”中的挣扎
——“孤岛”与沦陷时期(1937—1945)上海文化人的行为分析 …… 417
上海隔都：日军对犹太难民之管理体制 …… 427
抗战时期上海物价统制与商业统制总会 …… 440
抗战时期的海派书画家 …… 458
“抗日战争史研究新趋向”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470

《抗日战史》的前世今生

刘维开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一、前　　言

《抗日战史》是最早一套由官方编纂、出版，全面记述对日抗战期间国军在各个会战或重要战役与日军作战之“战史”。全书从1939年，全面抗战发生后的第三年，由军事委员会战史编纂委员会开始资料整理，进行编纂工作，初名“中日战史”；1946年，该会改组为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至1948年底完成中日战史初稿后，1949年4月办理结束，所有稿件移交国防部史政局，随后运至台湾；1950年起，进行战史初稿修正工作，1962年奉准由“国防部”史政局出版，定名为“抗日战史”，至1968年全书出齐，连同“总目录”一册，共一〇一册。内容包括战前状况、作战计划与作战指导、战争经过、重要战斗、海空军作战、后方勤务以及战后检讨等。

《抗日战史》出版后，最初仅提供军方参考，成为关于抗日战争论述的重要依据，1981年再版后，方对外公开，学者亦得以作为研究战争经过的主要资料来源。但是由于对战史归属的认知不同，历史学界对于这套由军方主编的《抗日战史》，长时期以来有着负面居多的评价。历史学界认为战史是军事史研究的领域之一，系从战争哲学或战争艺术的观点，记述军队作战经过，除了对参战两军之组织、训练、后勤、兵源、战力、情报、运动，以及战略战术等特点进行分析外，研究大兵团指挥作战方法、战略与政略的关系、会战及战斗中的高级战术，与阵中勤务、要塞攻防等；战史不同于军史，“军史”系探讨特定军队或军系的创立、成长、发展、兴衰、蜕变或消灭的经过，包括它们的军事组织、战术思想、人事状况、兵种比例、战斗序列、武器装备、教育训

练、战场研究、后勤补给、指挥能力、纪律士气等方面，并就其对历史影响之大小给予适当分析、介绍与评估。[①] 军方则将战史视为军事史政的主要项目之一，国防部史政局在1946年成立之初，即将军事史政分为战史、军事史与国防史三项，战史系指陆海空军作战之统帅指挥，及战斗过程经过的一切史实；军事史系指陆海空军及联合勤务一切有关行政与业务之计划、设施等史实；国防史则是凡军事、内政、外交、经济、交通、文化、社会及科学地理有关国防之史实均属之。[②] 因此战史编纂与出版一直是军方史政单位之主要业务，而《抗日战史》实为军方史政单位自设置以来所编纂、出版篇幅最大的“战史”。

事实上，《抗日战史》从开始编纂到成书出版，前后将近三十年，时间不可说是不长，在这么长的时间中，军方究竟如何编纂这套战史？本文主要目的即希望经由档案、相关当事人留存资料，以及学者关于抗日战史与国军史政工作之研究成果，探讨该书从编纂到成书、出版的经过，兼及后续相关战史整编以及海、空军之抗日战史，并思考如何应用这套战史，以补充抗战史研究中对于战争，包括会战与战役研究的不足。本文所参阅编纂抗日战史之档案，分别来自两岸史政或档案机构所庋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档案虽然由不同机构管理，但是来源主要为战史编纂委员会，具有相当强烈的互补性。

二、战史编纂的开展

传统中国虽然有史官之设置，但是没有专门编纂战史的组织，至清末官制改革，军事部分仿效德、日，采行军政、军令二元化体制，[③]以军咨府为军令系统之参谋本部，开始建置负责编纂战史的单位。中华民国建立后，编纂战史之业务，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属参谋部，北京政府时期为参谋本部。1928年10月，南

① 刘凤翰：《中国近代军事史资料与研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院编辑委员会编《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6月），页835—836。

② 陈佑慎：《“国防部”的筹建与早期运作（1946—1950）》（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研究部博士论文，2017年6月），页261。

③ 关于清末民初军政、军令二元化体制的确立，参见陈佑慎：《“国防部”的筹建与早期运作（1946—1950）》，页23—29。

京国民政府成立，战史编纂工作，仍属参谋本部职掌之一。①

1934 年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设立剿匪战史编纂处，负责相关战史之编纂工作，至 1935 年 2 月，南昌行营撤销，该处以编纂业务尚未完成，改隶参谋本部第二厅继续工作，更名为战史编纂处，为军事机构设置战史编纂专责单位之始。② 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面对日抗战，军事委员会改组，设置第一至第六部，以第一部掌军令；次年 1 月，军事委员会再度改组，将第一部与参谋本部合并为军令部，掌国防及用兵事宜，设第一、第二及总务三厅，其中第一厅职掌之一为“关于战史资料之搜集、编纂及战术、战略之研究事项”，归第四处负责；战史编纂处亦改隶军令部，为所辖单位之一。嗣后随战事发展，军令部以第一厅第四处保管战史资料日多，无法整理编纂，而战史编纂处以编制所限，其工作重心侧重编译国外战史，对于中日战史编纂业务实难兼顾。1939 年初，以指导编纂战史并战略战术之研究与改良为由，呈准将战史编纂处扩大为战史编纂委员会；复以重庆时常遭受日机空袭，对于编纂工作多有不便，于是年 3 月 24 日将战史编纂委员会会址移至江北县属柏溪附近之张家祠堂，开始进行中日战史编纂工作。③ 嗣后军方史政单位将《抗日战史》原稿称为“柏溪稿”或“柏溪稿档案”，即由此而来。1945 年，该会由柏溪迁至重庆办公，但因房舍狭小，不敷使用；抗战胜利还都南京，该会经国防部核定暂留重庆，遂另觅新址，经签奉核定接收青年军管理处驻用之大溪别墅二、三两号房为新会址，但至该会结束，一直驻留重庆。

依据《军令部组织规程》，战史编纂委员会负责中外战史材料之搜集、研究、整理、编纂事务，设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各一人，专、兼任委员若干人，下设编纂组、编译组等单位；编纂组负责北伐战史、中日战史编纂整理事项，编译组负责日俄战争、世界大战史之编译整理事项。④ 实际上，该会之主要工作为

---

① 关于国民政府军事史政组织的演变，参见李庭瑜：《从史料局到史政局：战后台湾军方史政制度之演变及其编纂事业(1946—1973)》(淡江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班硕士论文，2013 年 1 月)，页 42—50。

② 《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沿革史》，页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档馆”)藏，787/337。本项资料感谢杨善尧先生协助搜集。

③ 《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沿革史》，页 2—3，二档馆藏，787/337。

④ 《战史编纂委员会组织职掌编制案》，1939 年 1 月 17 日，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以下简称“档管局”)藏，B5018230601/0028/022.1/6355。

编纂中日战史，军令部长徐永昌并以中日战史为中国第一部对外战史，曾多次指示该会对于编纂工作务必做到“真、详、正”三个字。[①]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前夕，战史编纂委员会改组，由军令部第一厅副厅长方旹出任主任委员，并奉命改进该会业务。方旹拟妥改进方案，于 9 月 15 日提交部务会议通过后，17 日提交军事委员会各部联合会报，经主席军政部长陈诚裁示：“战史应早编完成，可将改进方案分送各出席单位，于一星期内提出书面意见，送军令部参考修正，再呈会核定。”10 月 8 日，改进方案之修正案提各部联合会报，经陈诚指示“可签呈委座核示”；[②]10 月 14 日，徐永昌以“提前完成中日战史初稿，拟具战史编纂委员会改进方案”为由，将全案签请蒋中正核定，内容如下：“一、先搜集重要资料，于一年内编成战史初稿，尔后即以此初稿为基础，汇编完善战史。（概计重要会战三十八个，已编成十四个，待编者尚有二十四个）二、依需要将该会人员相予增加，综计编设官佐一百九十一员。（原编制五十七员，增加一百三十四员，将官级原编设二十一员，新编四十六员）士兵一百二十一名。（原设三十七名，增加七十四名）经费概算另报核。三、为奏功容易，拟调集各部会及战区主管作战人员，参加工作。”蒋氏批示：“其编制可照办，但新编增加人员，尤以将官太多，应核减。其编纂委员应调用各部会高参部附及陆大教官兼任为原则，交程代总长审核。”[③]11 月 3 日，蒋氏针对战史编纂事，手谕徐永昌，指示：“各军师团在抗战中之阵中日记，及各军师之战史，希通令于明（卅五）年三月份人前呈报军令部审核汇编为要。”[④]复于 5 日召见方旹，面示：“改进方案已批示，中日战史极关重要，应切实负责，并督饬各职员均要负责，团以上之阵中日记，须速催报齐。”[⑤]可见蒋氏对于战史编纂一事之重视。

1946 年 2 月，战史编纂委员会实施新编制，设正、副主任委员各一人，业务部门设研审（研究审核）组、编纂组、编译组、资料室，三组均设专、兼任委员若

---

① 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五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年 12 月），页 496。

② 《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沿革史》，页 4—5，二档馆藏，787/337。

③ 《徐永昌呈蒋中正为提前完成中日战史初稿拟具战史编纂改进方案》，《蒋中正“总统”文物》，“国史馆”藏，数位典藏号：002－020400－00026－014；《陈诚呈蒋中正请保留军政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由史料局指导战史编纂业务并限其照编制充实人员及完成初稿后移史料局接办等文电日报表》，《蒋中正“总统”文物》，“国史馆”藏，数位典藏号：002－080200－00533－273。

④ 《蒋中正电徐永昌由军令部审编各军师团抗战阵中日记及战史》，《蒋中正“总统”文物》，“国史馆”藏，数位典藏号：002－070200－00022－118。

⑤ 《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沿革史》，页 5，二档馆藏，787/337。

干人，三组组长由委员兼；事务部门设会办公室、会计室、检诊室等单位。是年5月，国防军事机构改组，军事委员会撤销，于行政院设置国防部，于参谋本部下设史料局，掌理国军史政业务。依据军事委员会颁布《军事委员会各部院厅局编并国防部计划》，战史编纂委员会之业务由史料局接收。复以战史编纂委员会情形特殊，负责军事委员会改制作业之中央军事机构改组委员会同意该会暂时保留，专责完成中日战史之编纂，业务则由史料局督导。7月3日，参谋总长陈诚召见方昉，指示："中日战史应从速编成，目前应以全力搜集史料"，并亲下手令："由史料局与原战史编纂委员会会同派员分别至各行营、各战区、各集团军，及各军师接收抗战期内，关于所有作战文件为要。运输史料由兵站负责，应报史料可列表附发，并以参谋总长名义，函各将领，盼其负责搜集史料。"①8月28日，陈氏就保留战史编纂委员会事呈报蒋中正，曰："查战史编纂，业务繁难，以前系由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办理。此次中央军事机构改组，本应编并，但因事实需要之人员，非本部各厅局所能容纳。爰准保留该会于国防部，业务由史料局指导，并限自本年八月起，以三个月照编制充实人员，再以一年完成初稿，尔后移史料局接办。"②依照陈氏签呈，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改隶国防部，更名为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继续运作至1947年10月。在此同时，战史编纂委员会亦就机构保留所产生职责划分、编制修改、人员充实及还都准备等问题，与史料局进行商议。前三项均没有问题，战史编纂委员会专任编纂中日战史，而在还都一项，史料局局长吴石以南京房舍分配困难，史料运输尤非易事，建议该会暂留重庆工作，待各种条件便利后再行决定。③ 由于战史编纂委员会未随国防部各单位返回南京，导致部内人员调入该会工作之意愿不高，人事无法适时补充，加上史料搜集不易、体例变更等因素，战史编纂工作延宕，难以依原订时间，1947年10月结束，乃呈报国防部，说明相关情节，期望展期。经国防部指派史政局（史料局更名）局长吴石偕同美籍顾问艾克上校于1947年

① 《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沿革史》，页27，二档馆藏，787/337。

② 《陈诚呈蒋中正请保留军政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由史料局指导战史编纂业务并限其照编制充实人员及完成初稿后移史料局接办等文电日报表》，《蒋中正"总统"文物》，"国史馆"藏，数位典藏号：002－080200－00533－273。

③ 《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沿革史》，页57—65、77，二档馆藏，787/337。